

〈虬髯客〉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陳 飛 龍

〈虬髯客〉寫的是一些非常人物、在非常時代、所作的一番非常事跡。這篇傳奇由於故事離奇、結構嚴密、文辭優美，在唐代諸多傳奇作品中，算得上是篇膾炙人口、家喻戶曉的佳作。據推斷本篇大致在唐宣宗大中十年（西元八五六），到僖宗光啓初（西元八八五）這三十年間創作。當時，先有浙東的裘甫稱兵、和雲南的南詔侵擾；接著有龐勛、王郢、王仙芝、黃巢、秦宗權等人叛反；後來又有李克用、朱全忠相爭不下，終而引起唐朝畿輔諸藩的亂國。朝廷由於既有李德裕、牛僧孺的朋黨不和，餘波未了；外加藩鎮跋扈、和盜賊蜂起，社會呈現極度不安，統治政權更是動盪不已、搖搖欲墜。當時的混亂情形，和隋煬帝晚年時期十分相像，作者觸類興懷，望治心切，一面利用歷朝的開國神話，道教的圖讖預言，一面秉持唐人的定命思想，寫成了這篇傑出的故事。作者寫的雖是傳奇，在筆法上所極力模擬的卻是史傳。末段有作者的結語，無疑仿照的就是史遷。篇中說「乃知真人之興也，由英雄所冀。況非英雄者乎」？本篇的寫作主旨，在於替唐朝皇室作警凶戒頑的工作，話說得明明白白，根本不用猜疑。

在明、清時代，一般文藝作家常常利用本篇的素材，製成的各類文藝作品著實不少，曲本有：凌初成的《虬髯翁》，張鳳翼、張太和各一篇〈紅拂記〉，馮夢龍的〈女丈夫〉；繪畫歷代都有創作，一般都稱《風塵三俠》。

從南宋初年開始，有程大昌和洪邁兩人，依據歷史和詩文中記載，提出一些適切討論，一般說來很有參考價值。程大昌在《考古編》卷九〈虬髯傳〉條中說：

「李靖在隋嘗言，高祖終不爲人臣，故高祖入京師，收（拘捕）靖欲殺之。太宗救解，得不死。高祖收靖，史不言所以（情由），蓋諱之也。」

「〈虬髯傳〉言靖得 鬚客資助，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，此文士滑稽（戲謔取笑的言辭）而人不察耳。」

「又杜詩（〈八哀詩〉中〈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〉）言虬髯似太宗。小說（《西

《虬髯客》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陽雜俎》)亦辯人言太宗虬鬚，鬚可以掛角弓，是虬鬚乃太宗矣。」

「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，可見其為戲語也。」(註一)

洪邁在《容齋隨筆》卷十二〈王珪李靖〉條，先說王珪，和本文的討論關係很少，稍有參考價值的只有四句(都見於杜甫〈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〉詩)，前兩句是「次問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」，意思說：過訪的賓客中「最年少」的是誰？說那就是瀟灑「虬髯」的「十八九」歲的太宗；後兩句是說「秦王時在坐，真氣驚戶牖」，意思說：太宗未即帝位前，和王珪已有過從，當時他也在訪客之中，那副「真」人的「氣」象，可驚動了躲在「戶牖」後面窺視的珪母李氏。後面一段是說杜光庭的《虬鬚客傳》，抄錄如下：

「又有杜光庭《虬鬚客傳》云，隋煬帝幸江都，命楊素留守西京，李靖以布衣往謁，竊其一技，道遇異人，與俱至太原，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，言其真英主，傾家資與靖，使助創業之舉，即太宗也。按史載唐公(高祖稱帝前之封號)擊突厥，靖察有非常志，自囚上急變。」

「後高祖定京師，將斬之而止，必無先識太宗之事。」

「且煬帝在江都時，楊素死已十餘年矣。」

「此一傳，大抵皆妄云。」(註二)

上引兩段文字，都舉歷史文獻來評定《虬鬚客》這篇文字所述「大抵皆妄」，儘管批評的並非不確當，但一律都不能動搖本篇在文學上的超越成就。一直到了現代，胡適在〈論短篇小說〉乙文中，才開始從純粹文學的觀點，對本篇加以批評、肯定，以為本篇具有三項優點，說得大體還算平實穩健。意思說：

- 一、在豪俠的故事中，插入一段情史，立意和布局，都具有小說家的上等工夫；
- 二、以歷史人物如李靖、劉文靜、文皇太宗等，和非歷史人物如虬鬚客、紅拂妓等穿插混夾，構成的故事，並不背離事實；
- 三、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，即使配角，也各有神情風度。(註三)為了對本篇有進一步的瞭解，先行對本篇的「篇名」和「作者」作一深入的探討。

甲、關於「篇名」

依據現有的資料，〈虬髯客〉這篇傳奇，最早見載於宋李昉等編《太平廣記》卷一百九十三、豪俠一。現今傳世的《太平廣記》版本可見到的共有四種，比對文句，幾乎完全相同，應該屬於同一個來源，那就是一般所謂的「談刻本」。（「談刻本」所根據的就是《太平廣記》南宋刻本。關於版本的問題，暫且擱下，這裏只說篇名）在四種版本中，所收本篇的篇名一律都叫〈虬髯客〉；篇末都注有「出〈虬髯傳〉」四字；同樣也都沒有標示作者。

本篇由於收輯、著錄的書籍或出處不同，篇名的變化可真不少，除了前面說到的〈虬髯客〉和〈虬髯傳〉以外，還有〈張虬鬚傳〉、〈虬鬚客傳〉、〈虬鬚傳〉、〈虬鬚客傳〉、〈虬鬚客〉、〈虬須客傳〉六種名稱，爲了討論、查檢上的便利，把有關文獻的書名或出處，分別抄錄如下：

- 一、唐蘇鶚《蘇氏演義》下卷有〈張虬鬚傳〉，撰者是「近代學者」；
- 二、宋程大昌《考古編》卷九，收有〈虬鬚傳〉一則，未列撰者；
- 三、南宋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十二、「王珪李靖」條下，說到〈虬鬚客傳〉，撰者是杜光庭；
- 四、《宋史》卷二百零六、〈藝文志〉五、子部、小說類，著錄〈虬鬚客傳〉，撰者是杜光庭；
- 五、明陶宗儀所輯《說郛》、經姚安和陶珽「重校」的一百二十卷本（宛委山堂刊本）中第一一二卷收〈虬髯客傳〉，撰者是張說；
- 六、明正德年間顧元慶所輯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收〈虬髯客傳〉，撰者是杜光庭；
- 七、明《正統道藏》「恭」字號、洞玄部、記傳類、〈神仙感遇傳〉卷四第七，收有〈虬鬚客〉一篇，撰者是杜光庭；
- 八、明楊士奇等編《文淵閣書目》卷八、「荒」字號、第一爵書目、子、雜附，著錄「〈虬鬚客傳〉一部一冊，闕」，未列撰者；
- 九、清王文誥輯《唐代叢書》，第四輯收〈虬髯客傳〉，撰者是張說；
- 十、清顧懷三《補五代史藝文志》，「小說類」著錄〈虬須客傳〉，撰者是杜光庭；
- 十一、清馬俊良輯《龍威秘書》，第四集《晉唐小說暢觀》，第三冊收〈虬髯客傳

〈虬髯客〉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〉，撰者是張說；

十二、近人汪辟疆編《唐人小說》，上卷收〈虬髯客傳〉，撰者是杜光庭。

在以上所提到的許多本篇名稱中，以〈虬髯傳〉和〈虬髯客〉出現得最早。後者〈虬髯客〉，顯然是《太平廣記》編者依據原篇名〈虬髯傳〉所作的改變，其中似乎存有兩項考慮：一、這篇作品既然要把它歸屬於「豪俠」一類，「豪俠」是「人」，是「角色」，稱「虬髯」總不如加上一個「客」字的好；二、這篇故事中摻雜了虛構部分，不是歷史記載，省去「傳」字要比保留「傳」字來的妥當。

另外，「虬髯」這個角色在各處出現，或稱「張虬鬚」、或稱「虬鬚」（「須」是「鬚」的本字，也作「虬須」），或稱「虬髯」。經檢查各收錄的本篇原記述文字、或有關的說明，推想所指的應該同屬一個角色。就字面講，「鬚」，是面毛，「在頤（下巴）為鬚」；「髯」，是頰毛，「在頰為髯」，好像含混不得；可是應用起來，分得並不那麼十分嚴格：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六〈蜀書〉六、〈關羽傳〉：「（關）羽美鬚髯」（註四），這裡的「鬚髯」二字，諸葛亮卻要稱作「髯」。還有，國劇中稱掛「鬚口」（鬚子）的角色叫「鬚生」。從這些可以知道，實際上「鬚」「髯」兩字通用。而且，故事中「虬髯」的形象，和文皇太宗極為相仿。相傳太宗髯上能夠掛角弓，「虬髯」或許正好如此作為。「虬髯」和「虬鬚」，一個翹，一個垂，前者更多幾分英武之氣，所以說「髯」字又實在比「鬚」字好。至於「張虬鬚」這個「張」字，是他見到的原本中「篇名」中的字，還是蘇鶯因為故事中「虬髯」姓「張」隨手加上去的，實在都無關緊要。故事中「紗帽褐裘而來，亦有龍虎之狀」的稱「虬髯」；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」的是「太宗」，說什麼也混淆不了。單就字面而言，「虬髯」似乎比「張虬髯」更響亮、更有力。

「小說」類文學作品的命名，雖然沒有任何固定的規律，但一般說來，似乎可以分成兩類方式：一、從作品「主題」、或「接近主題」的「有關辭語」去考慮；二、從小說「主角」的「稱謂用語」去斟酌。前面所舉本篇的各種命名，無疑都屬於「第二」一類。說到本篇中的「角色」，像楊素、劉文靜、和乘瘦驢、善望氣的「道兄」等人，只不過是「過場」人物，只算「配角」；文皇「神氣清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燁如也」，雖是掌握「此世界」的「真主」，也是作者所要一心烘托的重心人物，但是從讀者的立場

去看，究竟用筆不多，出場時間有限，委實不夠稱為真正的「主角」。剩下來的三位，李靖、紅拂、和虬髯，都不愧是「風塵」中的「三俠」，才是故事的主幹所在。先說李靖，儘管他是布衣一個，卻「儀形器宇」有「真丈夫」的形象，又胸懷奇策，自以為是位「有心」人。再說一妹紅拂，既具有「天人之姿」，又蘊蓄「不世之藝術」；不僅富識見，多決心，賞鑒人物尤其特長。再說三郎虬髯，外貌「赤髯如虬」；行動「乘蹇驢」，「其行若飛」；或「褐裘」，或「紗帽」，都有「龍虎之狀」；但「於此世界」既已「失卻局」，就將求事建功、「龍戰」資材，掃數轉贈李郎，佐助文皇締構王業，以達成「榮一妹」的願望。這三位人物，都富有俠義氣質，如以「紅拂」作為篇名，稱什麼「紅拂妓」或「女丈夫」，雖然可比「李靖」「李郎」更為引人注意。可不能忘卻「虬髯」「三郎」，才是「俠客中的俠客」，用他來作命名，比其他二人更為適當。在這裡，我們只好依照《太平廣記》，稱本篇叫〈虬髯客〉。

乙、關於「作者」

依據上節對「篇名」的討論，已經約略知道〈虬髯客〉的「作者」，古今以來有各種說法，現在照年代先後的次序，分別敘述如下：

一、作者是「近代學者」

此說，見於唐代蘇鶚的《蘇氏演義》下卷〈張 髯傳〉條，原文說：

「近代學者著〈張虬鬚傳〉，頗行於世，乃云：隋末喪亂，李靖與張虬鬚同詣太原，尋天子氣，及謁見太宗，知是眞主。」

首先要認清的是，蘇氏所說到的〈張虬鬚傳〉，從上述引文來看，和今傳本篇的故事內容完全吻合，指的應該是同一本著作。蘇氏的時代既然已經看到這篇文字，卻未曾著錄，可見當時本篇一定流傳不廣，或許只在少數對政治有興趣的高級知識分子間傳播也說不定。復查《新唐書》卷五十九、〈藝文志〉三、小說類著錄《蘇鶚演義》十卷下注「光啓中進士第」六字。蘇氏活動的時代和身分總算透露了一點消息。蘇氏有著作傳世，據《四庫全書書目提要》，《演義》原本不止兩卷，從文獻稽考的作用上說，不失為一部具有價值的書。蘇氏既然及第於「光啓」中，他所說的「近代」，如果只是「近時」、「近年」的意思，同時又認定本篇的撰述，完全由於天下擾攘，才有所興發，如果依

〈虬髯客〉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據此一線索去審度唐代的歷史，蘇氏的所謂「近代」，應該不超出唐宣宗大中十年（西元八五六）到僖宗光啓初（西元八八五），這三十年間。

如果作者在文末所作的「結語」，只不過是種煙幕，其所以如此作為，為的只是布置疑陣，生恐觸怒當軸，無端惹禍上身。作者真正所要警戒的，並非類似隋末那些擁兵自重、擾攘相爭的「英雄式」人物，實在用的是「指桑罵槐」手法，心目中的對象卻是「非英雄」輩，可是對李氏政權又存有覬覦之心的「諸武之類」，尤其是用盡心機、求立太子、企圖雀巢鳩佔的武三思。如果這項推想不是沒有可能，如此蘇氏的所謂「近代」就得上推到中宗神龍（西元七〇五）初年。從光啓到神龍相距只不過一百八十年，似乎也不一定不能包括在一般所謂的「近代」範圍之內。

再說，蘇氏的「學者」二字，含義可能有兩類：一、「學者」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，僅僅說明這人是個「作家」而已；二、作者是誰，也可能學術界早有傳聞，此人真正具有「學者」身分，只是作者自己不願公開承認，後人也就不便指明罷了。誰是作者，既然沒人揭露謎底，也就只能說他是「近代學者」了。

也許有人覺得前面對作者創作本篇動機的推想，缺少積極的證明，似乎毫無意義。但是，為了後面有關討論的進行獲得幾許便利，在這裡，還是說上一些作個開端的好。

二、作者是「佚名」

最先用「姓名從缺」，也就是以「佚名」方式來處理本篇作者誰何問題的，是北宋太平興國初、李昉監修瀛蒙李穆等共同纂輯的《太平廣記》。該書卷一百九十三、豪俠類一所收本篇篇末的注語作「出〈虬髯傳〉」。想來，所根據的原書必定也沒有繫作者。復據蘇鶚《蘇氏演義》下卷〈張鬚傳〉條，可知蘇氏在世的光啓（西元八八五年）前後，甚至他所說的「近代」，可能向上一推推到唐宣宗大中十年（西元八五六），都沒有指明本篇作者是誰？這表示「佚名」的事實，早在《太平廣記》成書以前，相距近一百年，已經存在。北宋王堯臣等撰《崇文總目》卷四「傳記類」，僅著錄〈虬髯客傳一卷〉，不言作者（註五）；宋鄭樵《通志》卷六十五〈藝文略〉「傳記、冥異」類，著錄〈虬髯客傳一卷〉，並小註「記李衛公事」五字，亦不記「作者」姓氏（註六）。本篇文辭優美，如果具名也無損於作者；說到主題，在為唐朝皇室的正統說教，一般也不牽涉到政治問題。可是作者卻掩掩藏藏，不知所為何來，實在耐人尋味！

三、作者是「杜光庭」

此說最先見於南宋洪邁的《容齋隨筆》卷十二「玉珪李靖」條。《宋史》卷二百零六、〈藝文志〉五、子部、小說類，著錄本篇作者為「杜光庭」。想來，所依據的就是洪氏《隨筆》。洪氏肯定本篇作者是杜光庭，可並未說明依據何在？在進一步討論之前，且將杜氏傳記大要敘述如下：

杜光庭，字聖賓，處州（府名，隋置，後稱括州）縉雲（今浙江永康縣）人；一說長安人。生於唐宣宗大中四年（西元八五〇），卒於五代後唐明宗長興四年（西元九三三），活了八十五歲。由於他長年過著修道的生活，習性簡直而又閑雅，器度寬宏且有識見，初次相見，常常給人一種「廟堂（朝中）寶玉」的印象。少年時代，潛心從事經史的研究，辭章寫作尤具專長。唐懿宗咸通（西元八六〇—一八七三）年間，設置「萬言科」徵選士人，光庭參選落敗，一時感覺前途茫茫，就到離家不太遠的天臺山去學道。這時候，他才二十歲出頭。在山中，他以一失意的儒生潛心道學修持，受到道教中人的尊重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僖宗繼位，年紀只有十二歲，又是懿宗的第五子，他所以能夠登上帝位完全是宦官韓文約和劉行深的力量。由於僖宗為普王時，和宦官田令孜已很親近，即位不久，韓、劉乞休，就命田令孜做了左神策軍中尉，從此一切軍政大權完全由他一人掌握。

僖宗在位最初一、兩年，天下變亂不息，先有王郢在東南兵變。王郢被殺，在北方又有王仙芝、黃巢的民亂。

乾符五年（西元八七八），王仙芝敗死，部眾投依黃巢。廣明元年（西元八八〇）正月，黃巢破洛陽。就在這時以前，長安有位具道術、受重視的潘導師，常在皇帝面前說起杜光庭才學了得，因而杜氏才得受召覲見，出任「麟德殿文章應制」。這雖然只是個閒散官職，但對光庭來說，總算飛上枝頭，實現了當年未能實現的夢想。當時杜氏三十五、六歲。他能夠奉召任官，與其說那是由於具備「通經史、善辭章」的條件，倒不如說是十多年來「道士生涯」續下的一段因緣。

廣明元年十二月初，黃巢攻佔潼關。此時朝中軍政事務全由左軍中尉宦官田令孜掌握，他為了怕擔負謀國重罪，請准僖宗，把宰相盧攜降職貶官，表示一切該由宰相負責。傳說賊兵將到，盧氏服毒自盡。就在同一天，皇帝也逃到了山南（道名，在終南、

〈虬髯客〉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太華山南)。同月中旬，賊兵進據內宮，僭稱大齊。

明年正月，僖宗在興元（府名，今陝西南鄭縣）。各路勤王的軍隊向京城匯集，黃巢迫於形勢，棄長安東走。但因為各路勤王兵馬號令不一，賊兵於是再破長安。六月，僖宗移駕成都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是田令孜的同母哥哥，皇帝車駕到境，敬瑄即行前來迎奉。七月，改廣明二年為中和元年。

四年（西元八八四）七月，黃巢為部將所殺。早先，禁軍曾奉命討伐山南西道節度使龐晏弘。龐氏東走後，他手下的屬將王建、韓建、張造、晉暉、李師泰等人卻各率本部軍，九月抵達成都。僖宗正感軍力孤單，陡增實力，高興的不得了。就讓他們歸「十軍觀軍容使」田令孜直接節制。令孜收他們做養子，各授諸衛將軍，做皇帝的隨從護衛，號稱「隨駕五都」。

明年（光啓元年，西元八八五）正月，僖宗離成都。三月，返京師。在這段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流亡日子裡，光庭一直跟在皇帝身邊，多年來朝廷的事務都由田令孜操縱，想來光庭一定明白這件事實，自然也深深懂得如何自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僖宗回長安，杜氏卻仍舊滯留在西川，可能由於杜氏得到的寵幸不夠多；可能時局不好，皇帝忙於享樂，受到一些冷落；可能由於他有識見，長期接近權力中心，發現政權需要兵權支持，守在帝王身邊不一定有希望，已經心灰意懶。

僖宗從成都返長安前，田令孜曾募集新軍，組成左右神策十軍。禁軍軍旅眾多，為了開拓支應的財源，田氏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為鹽池課稅發生爭執。重榮累表申述鹽池由他兼管的必要，並陳明令孜離間方鎮的事實。令孜不悅，光啓元年（西元八八五）六月，令孜派邠寧節度使朱玫會合鄜、延等州兵力討伐重榮。王氏向太原李克用求援。雙方對壘，朱玫敗走，禁軍潰散，李克用的沙陀兵進逼京師。令孜奉僖宗幸鳳翔。

明年正月，宰相蕭遘不滿田氏弄權，召朱玫來鳳翔迎奉帝駕。令孜聽到消息，遣使僖宗臨幸興元（今陝西南鄭縣）。初入散關，通往興元的棧道遭人焚毀。當時，王建任清道斬斫使，背負玉璽，隨侍在僖宗左右。夜宿山坡下，僖宗枕在王建膝上睡去。醒後僖宗啼泣不已，解下淚濕的長袍贈建。到興元後，命王建遙領壁州（今壁山縣，在巴縣西北）刺史。這時候，田氏生恐即將獲罪，就以劍南（劍關以南）西川節度監軍的名義，前往投奔哥哥陳敬瑄；並且以楊復恭代神策左軍中尉。因為王建是令孜的舊人，不容

於楊復恭，只好離開興元，先據利州（今四川廣元縣），召集亡命和溪峒夷民襲取閬州（今四川閬中縣），自稱防禦使。一面遣使向僖宗表示忠誠，一面愛民養士，等待世局變化。

陳敬瑄擔心王建和東川節度使顧彥朗過分接近，對自身構成威脅，就利用田氏寫信要王建到成都來，佐助敬瑄，共創事業。等到王建領兵前來投靠，陳氏卻聽信部屬的進言，派人在中途加以攔阻。王建大怒，發兵攻成都，連攻不下，退守漢川（今四川廣漢縣）。文德元年（西元八八八）三月，僖宗駕崩，昭宗即位。下詔削去陳敬瑄官職，並命王建討伐敬瑄。爭戰三年後，終於佔領成都，殺死陳氏和令孜。朝廷就派王建為西川節度使。

接著王建又向東方推展，全部佔領川東地方。昭宗天復二年（西元九〇二），王建藉口勤王，又舉兵把李茂貞所佔據的山南西道各州鎮佔有一半。山南西道，是連接西蜀和京都的通道，地理形勢、和政治意義非常重要。昭宗封王建為蜀王。

天祐元年（西元九〇四），昭宗受制於朱全忠，頻臨死亡的時候，曾下密詔要王建勤王。等到昭宗為朱全忠所殺，王建慟哭，聲稱要替先帝報仇。兩年後，朱全忠即帝位，建國號叫梁，史稱後梁。王建在第二年也建國叫蜀，歷史上稱「前蜀」。蜀先主王建授光庭「金紫光祿大夫」。這是個沒固定職守、相當於「顧問」、「咨議」一類的散官，發表這種官秩，表示關切、榮寵的成分居多。接著，又給他個專負責任的「諫議大夫」。為了提高受職人的政治地位，此外又封他做「蔡國公」；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，又賞賜他「廣成先生」的稱號。所謂「廣成」，應該就是「具有多方面成就」的意思。先主出身微賤，讀書不多，可是即位後還肯留心政治，喜愛和知識分子接近。朱全忠篡唐後，唐代的宗室、遺臣、和中原士人到四川來避難的很多，大都能夠得到照顧。王氏政權有了這些流亡人士的支持，典章文物方面很能保持唐代的遺風。王建對唐朝遺臣作為如此，對於光庭可算是超乎尋常許多。

從前文有關僖宗流亡，宦官田令孜和軍校王建起落度化史實的敘述，對光庭和王建間可能的關係，應該可以找尋出一條雖然不夠清晰、但還算確切的線索。杜氏在王建手下服官，不始於「蜀王」時代，卻在唐亡以後王氏建國稱帝時期。這無異說明：光庭年近六旬，雖然不能完全忘情於政治生活，但他可也不是個飢不擇食、出處全無原則的人

〈虬髯客〉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。從僖宗廣明間出長安起，到光啓初離成都止，這二十五年間，在蜀先主的印象中，光庭必定是位具有多項才華、較完美人格的人。否則不會給他「廣成」「先生」的稱號，不會對他那般禮遇有加。

在杜氏著作表中，列有所著《諫書》八十卷（一說百卷）、《規書》一卷，所輯《歷代忠諫書》五卷，另有《兼明書》十二卷，未得翻檢細辨，不知是否諫議關連著述？從這方面可以看出：光庭對這份言官工作算得上十分熱心，說他期盼從這方面有所表現似乎也不為過。他過著宗教家修持的生活，卻有一顆熱中官場的心。不久，先主要他擔任太子的教師，並且由他推薦兩位儒者做東宮侍讀，不時還參議朝廷的政務。最後，請他做了戶部侍郎。從此可見，光庭儒學方面的修養，在當時是受到各方肯定的，但他雖然和當政者這般接近、這般受到尊敬，終久只做到侍郎，連做尚書都撈不到，必定在性格上有缺點，譬如見解迂腐、缺乏效率之類。

後梁末帝貞明四年（西元九一八），蜀先主王建死，後主即位。後主在宮中接受道籙，成為正式的道教徒。在即位前，光庭和他又有一段師生的淵源，照常情判斷，杜氏的政治生涯應該正好飛黃騰達，可是他被尊奉為「傳真天師」、授崇真館大學士後，卻又立即急流勇退。可能由於光庭已發現後主成日裡好陽毬，近酒色，全不理會朝政。光庭可能發現他棲息的不是良禽所要選擇的喬木，前途呈現一片灰暗。另一方面，自己已接近七十高齡，夕陽雖好，也是黃昏時候。過不了好久，他就解官離去，到成都北方的灌縣青城山白雲溪隱居修道，自號「東瀛子」。東瀛，指東海地方，是他的家鄉所在；也指海外仙山，就是今天的日本，顯示他有潛修道業的意願。

這時候，他建造了一座「和飧閣」（飧，指晚間黍稷之類的食物。和飧，作「用湯水調和早餐的剩飯、剩粥，當晚餐食用」講，有過刻苦簡樸生活的意思）——可見他退隱之前，手頭還很寬裕；或者，後主之類的什麼人給了他財力上的支持也說不定——奉行「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」，正式從事道業的潛修。八十五歲死亡，人們都說他只是得道尸解（肉體得到解脫），魂魄離開形體而去，成為天上神仙。杜氏一生著述很多，為了有助於進一步的研究，現在依據清人顧樸三的《補五代史藝文志》、清人吳任臣的《十國春秋·前蜀列傳·杜光庭》、《宋史·藝文志》等書所著錄，和明代《正統道藏》、流傳的道書，以及其它叢書所輯收，編製成杜光庭著作表如下。

四、杜光庭不是〈虬髯客〉作者

從上面編製杜氏著作表，共列著作七十七種，可說是洋洋大觀，其中大多和道教息息相關。如果稍加分析，不難發現，其中改寫、編訂的作品和真正的著述互相混雜，包含的問題實在不少，值得有人作深入的研究。在這裡，除了著作表「備考」欄已對少數著述偶作簡注，或在本篇前文中對另一部分已稍作討論以外，所要關注的只限於第二十四種《神仙感遇傳》中〈虬髯客〉一則，和第二十五種〈虬髯客傳〉兩種。

〈虬髯客〉這篇文字，不管名稱如何，「作者」歸屬問題，在南宋以前，一逕都以「佚名」方式處理，例如宋初太宗時代詔編《太平廣記》中所收輯的〈虬髯客〉就是；再不然就說它出於「近代學者」——這個「近代」，前面已經談過，指的應該是唐中宗神龍初到僖宗中和間這段時期，見於唐代蘇鶚的《蘇氏演義》。可是說本篇撰者是杜光庭的卻要遲到南宋洪邁的《容齋隨筆》才開始。從此以後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補五代史藝文志》中才有杜光庭撰〈虬髯客傳〉一卷的著錄。明人《顧氏文房小說》、明人《唐代叢書》、和民國《清人傳奇》所收的〈虬髯客傳〉，一律注明作者是杜光庭，這只不過是同聲附和罷了，可都沒有說出有什麼特別的根據。

據今人一般推測，《容齋隨筆》認定〈虬髯客傳〉為杜光庭所撰的那段文字（見本文前面所引），實際是指光庭依據作者「佚名」的〈虬髯客傳〉、節刪改寫而成的《神仙感遇傳》卷四第七中〈虬髯客〉一則；而不是改寫所依據的原底本、作者「佚名」的〈虬髯客〉。如果把《神仙感遇傳》中這則〈虬髯客〉（如附件一），和不明作者的〈虬髯客〉原篇，兩相比較，一定會發現：兩篇的主題完全相同；出現的人物，故事的架構，也都可說是毫無出入。其間，最大的差異只在：

- 一、表達方式不盡相同：「改寫本」在說故事；「原底本」卻利用人物「對話」、「場景」描寫，穿插進行，是在寫小說、寫傳奇。
- 二、寫作的心態也不一樣：「改寫本」是在宣揚道教，無疑是一篇夠標準的文字；「原底本」是道地的文學創作，全心全力追求塑造豪俠形象，說什麼都是一篇絕妙的佳構。

至於兩篇的文辭，從各自寫作的目的看，幾乎說得上各有千秋。如果一定要分個高下，站在純文學的立場，指派「改寫本」是變金成鐵、是化神奇為腐朽，好像也不是全無依據。

在這裡，且說一說《神仙感遇傳》卷四第七中〈虬髯客〉（即本文所稱「改寫本」

〈虬髯客〉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），對原作〈虬髯客〉（即本文所稱「原底本」）作了那些重要的刪減或修改？分三點敘述如下：

一、「原底本」首段，自「一日，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」到「乃雄服乘馬，排闥而去。將歸太原」，共計三百三十七字，描述紅拂見李靖來謁楊素，那種不亢不卑、滔滔雄辯的傑出表現，心生傾慕，臨軒指吏探詢名氏住址後，黑夜投奔；以及李靖既得佳麗人，內心喜懼，窺戶者足無停履的情形，「改寫本」卻刪除得乾乾淨淨，改寫後只有「衛公李靖時擔簞謁之，因得素侍立紅拂妓。妓姓張，第一，知素危亡不久，棄素而奔靖。靖與同出西京。將適太原」，四十三字。所用的文辭誠然簡潔可喜，但紅拂依憑長久的閱人經驗，作成投奔決定，所經過的全部心理、行動歷程，全已刪將了去，不能不算是一項嚴重的缺憾。也許，「改寫本」作者杜光庭遵奉的正是代表淄、青文化的士族傳統，正巧這又完全符合道教徒所堅守的道德規範。「原底本」佚名的作者，接受的卻是唐化外族異俗遺風的薰陶，傳奇中塑造出紅妓和李郎一雙情侶特出的形象，由於極其自然，也就非常成功。兩篇作者寫作的心態、所具備的文學修養，完全相反，很難想像他們是同一個人。

二、「原底本」作「曰：『煮者何肉？』曰：『羊肉，計已熟矣。』客曰：『飢。』公出市胡餅。客抽腰間匕首，切肉共食。」「改寫本」僅改寫作「割肉為食」四字，雖然用語十分簡潔，但深一層去想，會立即發現內容實在貧瘠，效果自然也就完全消失。要曉得，「原底本」在一問一答之間，再添上「出市（買）胡餅」一句，已經把北方人的一般飲食習慣、以及意外客來臨時湊合的情形，經濟而又充分地烘托出來。尤其這段共食的活動，自然都在「爐前」進行；這和前文所用的「投革囊於爐前」密切地連繫起來。「原底本」的「抽」、「匕首」、「切肉」、「食之」、「甚速」，實在比「改寫本」的「割肉為食」來得活靈活現些，彷彿已經看到有個狼吞虎嚥的粗野彪形大漢在。

三、「原底本」作「食竟，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，甚速」，「改寫本」卻作「客以餘肉餵驢」，這可能是「改寫本」作者對於原作的瞭解有問題；改作者或許因為前文已有「食竟」字樣，認為虬髯必定不能再食，既用匕首「亂切」餘肉，必定以之餵驢無疑。殊不知 髯雖然「食竟」，但基於主人心態，可能並未真正吃飽，或者因為「省肉」以「待客」、或者覺得「殘肉」餘殮不便保存，肚皮儘有伸縮餘地，不如吃光了事。如此才符合豪俠的本色。

根據以上敘述，我們深知〈虬髯客〉是唐代傳奇中的一個名篇。它的原作者實已不

可考。迨唐末杜光庭出，為著配合宣揚道教教義，乃取「原底本」〈虬髯客〉，加以刪簡濃縮而成今存《道藏》恭字、洞玄部、記傳類《神仙感遇傳》卷四之〈虬髯客〉（即本文所稱「改寫本」），以致後世乃誤以「杜光庭」為原作者而延誤至今。

【附註】

註一：程大昌《考古編》卷九，臺灣商務印書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八五二冊，頁五七。

註二：洪邁《容齋隨筆》上冊，卷十二，頁一五四。

註三：詳見胡適《胡適文存》第一冊，卷一，頁一三七—一三八。

註四：《三國志》卷三十六、〈蜀書〉六、〈關羽傳〉，第二冊，頁九四〇。

註五：王堯臣《崇文總目》卷四，臺灣商務印書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六七四冊，頁五〇。

註六：鄭樵《通志·藝文略》卷六十五，臺灣商務印書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三七四冊，頁三六一。

【引用參考書目】

《三國志》晉陳壽撰，劉宋裴松之注，鼎文書局排印本。

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宋歐陽修、宋祁撰，臺灣商務印書館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本。

《補五代史藝文志》清顧禮三撰，藝文印書館《百部叢書集成》本。

《宋史·藝文志》元脫脫等撰，臺灣商務印書館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本。

《十國春秋》清吳任臣撰，民國七十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四六五冊。

《崇文總目》北宋王堯臣等撰，民國七十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六七四冊。

《通志》宋鄭樵撰，民國七十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三七四

《虬髯客》「篇名」、「作者」考

冊。

《文淵閣書目》明楊士奇等編，民國七十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六七五冊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清永瑆等撰，藝文印書館影印原刻本。《正統道藏》新文豐出版社編輯，民國六十六年新文豐出版社影印本。

《考古編》宋程大昌撰，民國七十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八五二冊。

《蘇氏演義》唐蘇鶚撰，民國七十二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第八五〇冊。

《太平廣記》宋李昉等編，新興書局影印本。

《百川學海》宋左圭輯，新興書局影印本。

《容齋隨筆》宋洪邁撰，一九七八年七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。

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明顯元慶輯，藝文印書館《百部叢書集成》本。

《說郭》明陶宗儀輯，明姚安。陶珽「重校」，民國六十一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滙芬樓刊本。

《唐代叢書》清王文誥輯，新興書局影印本。

《龍威秘書》清馬俊良輯，新興書局影印本。

《杜詩詳註》唐杜甫撰，清仇兆鰲注，民國六十九年七月里仁書局排印本。

《胡適文存》民國胡適撰，遠東圖書有限公司排印本。

《唐人小說》民國汪辟疆編，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。

《唐人小說校釋》民國王夢鷗撰，民國七十二年三月正中書局排印本。